

美国海外大学：演进历程、发展特点及历史影响^{*}

陆军 田山俊

摘要：美国海外大学是美国在境外最早开展高等教育的办学机构，其先后经历了初创与早期发展阶段、协同发展与世俗转向阶段、衰落与新生阶段以及全球化扩张阶段四个不同发展阶段。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海外大学呈现出办学活动深受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美国化”与“本土化”动态博弈、独立办学与合作办学协调并举以及保持与美国本土大学密切联系等发展特点。在推动东道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为东道国及所在地区培养优秀人才以及促进东道国与美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等方面，美国海外大学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损害东道国教育主权、干涉东道国政治事务以及冲击东道国本土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美国海外大学；跨境高等教育；演进历程；发展特点；历史影响

作为美国跨境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美国海外大学是在美国境外建立的，在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均采用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美式教育而无美国母体高校并授予学位的独立的实体教育机构。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历史比当今“热议不衰”的美国大学海外分校（拥有美国母体高校）早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是美国在境外最早开展高等教育的办学机构。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于1955年在意大利建立欧洲分校（现存最早的美国大学海外分校）之时^[1]，美国海外大学已有近百年的办学历史。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海外大学仍保持强劲的生命力，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一些机构已成长为所在地区家喻户晓的著名学府，其办学活动日趋成熟且颇负盛名，如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是中东地区极具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享有“中东哈佛”的美誉。然而，与广为人知的美国大学海外分校相比，美国海外大学往往“因更多地融入东道国而被人们忽视”^[2]。事

实上，美国海外大学不仅对东道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还在扩大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乃至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战略作用，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然而，我国学术界一直对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历史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梳理美国海外大学的演进历程，并深入探讨其发展特点及历史影响，以期形成对美国海外大学发展全貌的深刻认识，增进对美国跨境高等教育的理解，为我国加快推进高校境外办学工作、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一、美国海外大学的演进历程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海外大学先后经历了四个不同发展阶段：初创与早期发展阶段（1863—1918年）、协同发展与世俗转向阶段（1919—1945年）、衰落与新生阶段（1946—1989年）以及全球化扩张阶段（1990年以来）。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状况随着时代的变

收稿日期：2024-08-27

作者简介：陆军，安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田山俊（通讯作者），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安庆/246133）

*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基于一流学科生成的西方大学学派发展研究”（BOA2201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迁而改变。

（一）初创与早期发展阶段：海外传教活动的产物（1863—1918年）

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其初创与早期发展主要受美国海外传教活动的力量驱动。1810年，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波士顿正式成立，大规模的美国海外传教活动快速兴起。为了不断适应海外传教活动的发展变化，美国传教士在寻找宗教皈依者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单纯宗教布道的传统策略，转而通过设立教会学校的方式来培养“受新教影响的能干且可靠的教师和牧师”^[3]，试图利用教育使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新教思想，以实现传播基督教福音之根本目的。随着教会学校的不断建立，教会学校的办学层次也从初等和中等教育逐渐扩展到高等教育。1860年，美国传教士赛勒斯·哈姆林（Cyrus Hamlin）从奥斯曼帝国返回美国筹集办学资金，并在纽约富商克里斯托弗·罗伯特（Christopher Robert）的慷慨资助下，于1863年在君士坦丁堡成功创立了罗伯特学院。罗伯特学院成为美国在境外创办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正式开启了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序幕，很快吸引了美国和当地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美国在奥斯曼帝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陆续设立了数十所美国海外大学，如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新教学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1866年，即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前身）和美国女子学院（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1871年）等；中国的东吴大学（1901年）和圣约翰大学（1906年）等；日本的立教大学（1907年）和神户女学院（1909年）等；印度的福尔曼基督教学院（Forman Christian College，1864年，现属巴基斯坦）和帕苏马莱学院（Pasumalai College，1881年）等。

这一时期，美国海外大学主要由美国传教士和教会组织创办，以传播基督教福音为宗旨，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美国海外大学以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教派学院为办学模板，其教师、教材和经费主要来自美国，并且以当地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学校的管理人员与教师大多为基督教徒。在强调宗教教育的同时，美国海外大学还开设了商学、医学和工程学等实用性专业课程，为所在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此时，美国海外大学的办学规模较小，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二）协同发展与世俗转向阶段：公益慈善事业的助力（1919—1945年）

20世纪初，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众多大型慈善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美国慈善事业随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繁荣发展，为美国海外大学的持续成长提供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在美国慈善事业的鼎力支持下，美国海外大学陆续出现了一批新的机构，如开罗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1919年）、菲律宾中央学院（Central Philippine College，1923年）以及阿尔伯兹学院（Alborz College，1928年）等。一战后，为了提高办学效率、节省运营成本，美国海外大学主动寻求建立机构间的协同发展关系，其办学活动日趋世俗化。1919年，罗伯特学院和叙利亚新教学院在美国纽约共同设立了联合办事处，以协调处理成员机构在美国的各项业务。随后，该组织吸纳了包括美国女子学院和索非亚美国学院等在内的其他四所美国海外教育机构，并在1927年正式更名为“近东学院协会”（Near East College Association，NECA），为成员机构开展资金筹集、教师招聘和物资采购等相关工作。在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NECA共获得36000多笔捐款，募集资金达2100多万美元。受益于NECA的积极协助，美国海外大学的财务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不仅成功抵御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烈冲击，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自身知名度。

由于地区政治局势的波谲云诡，以及基督教福音派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一战后的美国海外大学不断淡化自身的宗教色彩，不再一味强调基督教教义及其宗教仪式，逐渐转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例如，罗伯特学院完全取消了宗教教育课程，并废除了学生必须参加宗教礼拜仪式的规定。贝鲁特美国大学也不再宣称所有的知识必须符合基督教戒律，并将“塑造绅士”作为其重要培养目标，逐渐从宗教皈依转向品格塑造。即便是一向主张宗教皈依的开罗美国大学，也在20世纪30年代做出了相应的教育改革，强调自身对社会服务和国家发展的教育承诺。就本质上而言，美国海外大学主动淡化机构的宗教属性，旨在避免与东道国政府的教育政策发生冲突，以确保自身永续发展。正如罗伯特学院院长保罗·孟禄（Paul Monroe）所言：“随着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教育课程的规定被取消，我们认为我们不会与当局

发生冲突。但是，只要我们在我们的机构中保留任何宗教教育，或者进行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我相信我们将受到质疑，而这种质疑可能会以敌视我们一些最忠诚的员工的形式出现。”^[4] 总体上，“世俗转向”是一战后美国海外大学办学活动的主流趋势。但需要指明的是，尽管美国海外大学有意弱化自身的宗教取向，但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二战后，大多数美国海外大学才彻底抛弃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办学宗旨。

（三）衰落与新生阶段：争霸世界战略目标的刺激（1946—1989年）

二战后，“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在各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其中，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美国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重要方式^[5]，也是美国公共与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用以提升美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实现国家战略。^[6] 在此背景下，美国海外大学在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衰落与新生阶段，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近东和欧洲。这一时期，由于当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黎巴嫩内战爆发，近东地区美国海外大学从繁荣发展迅速转向衰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海外大学在近东地区的发展出现颓势，逐渐陷入低谷。一方面，近东学院协会走向了消亡，不再为美国海外大学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办学协助。另一方面，作为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肇端，罗伯特学院失去了高等教育办学权。此外，黎巴嫩境内的美国海外大学深受本国内战的袭扰，其发展状况一落千丈，特别是贝鲁特美国大学几乎陷入发展绝境。对此，《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纳修斯（David Ignatius）直言不讳地指出，“一所伟大的自由机构在阿拉伯世界慢慢消亡……它成为试图清除中东的西方影响的伊斯兰狂热分子的特别攻击目标。”^[7]

同一时期，欧洲成为了美国海外大学的“新生”之地。在美国拉拢西欧国家抗衡苏联的时局背景下，大量美国人旅居欧洲各地，美国海外大学开始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欧洲国家兴起，如巴黎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1962年）、瑞士美国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Switzerland，1963年）和罗马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Rome，1969年）等一批新生机构陆续成立（参见表1）。与之前由美国传教士或教会组织创立的近东教育机构不同，这些在欧洲国家建立的美国

海外大学主要由美国外交官、大学教师以及新闻记者等社会人士创办，其最初招生对象以美国学生为主，但也招收欧洲各国学生，主要为学生提供为期两年的副学士学位学习课程，完成学习任务后可转入美国本土大学继续深造。此时，美国海外大学出现了新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开始依赖学生的学费收入，而非私人资本家的慷慨捐赠。

表1 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海外大学在欧洲国家分布情况

国家	大学校名	建校时间（年）
法国	巴黎美国大学	1962
瑞士	瑞士美国学院	1963
意大利	罗马美国大学	1969
瑞士	瑞士富兰克林大学	1969
意大利	约翰卡波特大学	1972
英国	伦敦里士满美国国际大学	1972
塞浦路斯	美国学院	1975
塞浦路斯	吉恩美国大学	1985

资料来源：参考凯尔·朗（Kyle A. Long）的《美国海外大学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Abroad）一书中的数据资料，并结合对美国海外大学的实际调查整理而成。

随着美国海外大学在欧洲的快速发展，近东与欧洲两地的美国海外大学逐渐建立起紧密的合作联盟，于1971年成立了“国际学院与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并在1988年正式更名为“美国国际学院与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AAICU），旨在推广美国高等教育价值理念，促进欧洲、中东和亚洲等地美国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美国海外大学开始尝试寻求美国的高等教育区域认证，以获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如巴黎美国大学在1973年获得美国中部州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认证地位，成为第一所获得美国高等教育区域认证的美国海外大学。

（四）全球化扩张阶段：多方利益需求的共同作用（1990年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规模迅速扩大，机构数量急剧增加，从1990年的约22所增至2023年的约73所，分布在世界上约50个国家和地区（参见表2），入学人数近20万人。从表2可以看出，作为美国战略利益的要冲，中东地区是

美国海外大学的办学集聚地。在现有机构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机构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建立而成。苏联解体为美国海外大学在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而“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等中东局部战争则为美国海外大学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除此之外，美国海外大学还在西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逐渐建立起来。换言之，美国海外大学迎来了全球化扩张的新阶段。在新建的美国海外大学中，除了一部分机构由美国人创办，如保加利亚美国大学、亚美尼亚美国大学和中欧大学等，还有众多机构是在美国的协助下，由当地的政治家、企业家或知名学者创建，如阿拉伯美国大学、尼日利亚美国大学和越南美国大学等。值得注意的是，营利性的美国海外大学开始大量涌现，如迪拜美国大学、科威特美国大学和阿联酋美国大学等机构陆续建立，美国海外大学的办学形式日渐多样。

美国海外大学在这一时期迅速扩张，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契合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冷战后，为了维护全球霸主地位，美国在世界各地大力推广美式民主，并将美国海外大学视为传播美式民主的重要工具。保加利亚美国大学前校长爱德华·莱弗蒂（Edward B. Laverty）认为，基于知识反思和经验学习的美式教育是推动国家走向稳定民主和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8] 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激烈的社会变革之际，美国将这些国家作为推广美式民主的重要试验场，积极支持美国海外大学的办学活动。其次，受“9·11”事件的影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东地区人员赴美留学的限制政策，中东地区的学生产生进入美国本土大学的机会大幅减少。因此，在中东地区广设美国海外大学成为当地学生获取美式教育的一种重要替代方案。此外，一些高等教育体系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迫切希望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以加快建设本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当今世界跨境高等教育领域中，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9] 凭借其卓越的教育质量和良好的品牌声誉，美国高等教育吸引许多国家纷纷在本国设立独立的美式大学，从而加速了美国海外大学的扩张。最后，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趋兴盛，与之相关的诸如提高国际知名度、增加经济收入以及招募海外人才等现实利益需求，促使美国本土大学愿意接受来自美国境

外的办学邀请，为东道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计划提供全面支持。例如，缅甸大学在招聘教师、设置课程、招收学生、制定学术政策以及行政培训等方面为保加利亚美国大学的创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协助。综上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多方利益需求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海外大学的规模急剧扩大，其办学活动扩展至世界各地。

表2 美国海外大学的地区分布情况

分布国家/地区	地区数	学校数量(所)
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埃及、爱尔兰、安提瓜和巴布达、奥地利、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林、保加利亚、冈比亚、海地、荷属圣马丁、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捷克、喀麦隆、肯尼亚、罗马尼亚、马耳他、马其顿、孟加拉国、摩尔多瓦、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突尼斯、亚美尼亚、印度、英国、约旦、越南、乌克兰、埃塞俄比亚	37	1
巴巴多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墨西哥、瑞士、意大利	7	2
法国、希腊、伊拉克、塞浦路斯	4	3
阿联酋	1	4
黎巴嫩	1	6
总计	50	73

资料来源：参考凯尔·朗（Kyle A. Long）的《美国海外大学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Abroad）一书中的数据资料，并结合对美国海外大学的实际调查整理而成。

二、美国海外大学发展演进的主要特点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海外大学逐渐成为美国跨境高等教育领域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并呈现出鲜明的发展特点，如办学活动深受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美国化”与“本土化”动态博弈、独立办学与合作办学协调并举以及保持与美国本土大学密切联系等。

（一）办学活动深受美国外交政策影响

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海外大学的办学活动与美国外交政策紧密相连，其财政结构、学术发展乃至地域分布深受美国外交政策影响。二战前，美国主要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避免直接介入欧洲和其他大陆的政治冲突或战争。对于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美国政府主要扮演了“被动”角

色，以“口头支持”为主，仅在必要时通过外交手段协助其解决办学难题。例如，美国政府曾在保护当地雇员、经营和建筑许可及学位授予权等问题上与奥斯曼帝国政府进行多次交涉。^[10] 美国海外大学的运营工作几乎完全依靠私人捐赠、学费收入以及其他非政府资金的支持。自二战开始，美国的外交政策逐渐由“孤立主义”转向“国际主义”。随着文化外交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美国政府对美国海外大学的支持从最初的“口头支持”延伸到“物质支持”，开始为美国海外大学提供资金援助，扩大了美国海外大学的资金来源。在加入二战的头几个月，美国国务院便在奖学金、校园设施和访问教授职位等方面为贝鲁特美国大学提供了小额资助，以帮助其摆脱沉重的债务负担。^[11] 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还为近东学院协会提供了一系列援助资金，以保障其成员机构的正常运转。^[12] 罗伯特学院的校长沃尔特·赖特（Walter Wright）直言道：“没有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大学无法继续不间断地运营下去。”^[13]

二战后，美苏关系从合作转向对抗，美国的外交政策随之转变，开始推行“遏制苏联、争霸世界”的冷战策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以抗衡苏联扩张，大力支持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尤其对战略要地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外大学寄予厚望并提供了有力援助。美国国际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ICA）曾指出，如果没有开罗美国大学，“埃及的外国文化阵地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立者和苏联集团势力的控制，这将是埃及社会和西方世界的损失”^[14]。在众多的对外援助计划中，美国海外大学是美国政府资助的重要对象，其资助规模之大，以至于部分机构甚至严重依赖美国政府资金，导致美国海外大学的财政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例如，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资助已占贝鲁特美国大学年度预算收入的一半以上。^[15] 此外，二战后美国高度重视地区研究项目，大量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涌入美国海外大学，并利用其区域优势专注于地区研究项目的学习和研究。为此，美国海外大学开始大力开展地区研究项目，不断提升学术发展水平，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地区专业知识和政策建议。例如，贝鲁特美国大学推出阿拉伯研究项目，“对现代阿拉伯世界及其问题进行解释性研究”^[16]，对美国政府制定中东政策起到了莫大帮助。冷战后，美国根据国际形势

变化重新调整外交政策，致力于按照美国价值观和理想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以巩固全球领导地位。其中，推广美式民主成为美国外交事务中的重要事项，也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利益之一。^[17] 美国极力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推广美式民主，促使美国海外大学在东欧、高加索以及中亚等地区快速扩张，以填补因苏联势力消退而产生的文化真空，极大改变了美国海外大学的全球地域分布。综上可见，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化不仅拓宽了美国海外大学的资金来源，提升了其学术发展水平，还推动了其在地域上的战略扩张。

（二）“美国化”与“本土化”动态博弈

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海外延伸，美国海外大学具有明显的“美国化”特征，其在教育理念、课程设置、管理模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体现出美国的教育与文化烙印。此外，因深植于东道国社会土壤之中，美国海外大学也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倾向，在课程设置、管理模式和校园文化等方面与当地教育系统、民族文化和社区发展相融合。在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化”与“本土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一直保持动态博弈。

在早期发展阶段，美国海外大学的办学活动与美国本土大学相差无几，其“美国化”特征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作为最初设想为完全“本土化”的教育机构，叙利亚新教学院在获得稳定发展后，其“美国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且“美国化”力量逐渐占据上风。特别是受“刘易斯事件”^①的影响，校内的“阿拉伯化”力量基本被清除，叙利亚新教学院完全成为一所由美国人主导的美式大学，其“美国化”特征显著。一战结束后，由于东道国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美国海外大学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开始加速推进本土化进程。根据土耳其的世俗化教育政策，罗伯特学院适当调整了课程内容，以便“尽可能与公立学校的课程保持一致，同时也不会失去美国学校的独特性”^[18]，从而“在实现自身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且令人满意的进展，即提供一种基于美国理念与实践且完全适应土耳其需要的教育”^[19]。同样地，贝鲁特美国大学不仅扩充本地师资力量，并给予本地教师平等的师资待遇和决策权利，还开设了与当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相关的中东经济课程以及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课程等，其“本土化”特征日趋显现。二战后，许多新兴的独立国家开始加强对本国教育领域的监

管，特别是对外国学校的管理，以强化本国文化和教育体系的主权。由此，美国海外大学持续深化本土化改革，以增强对东道国文化和教育需求的感知与适应能力。一方面，美国海外大学不断优化管理模式，赋予当地人更多的决策权与领导职务，以彰显其对本土文化和社会民意的尊重，加深学校与当地社区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美国海外大学不断加强与东道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互动和沟通，主动与当地公立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罗美国大学的重要教学和行政职位几乎都有埃及人身影，该大学不仅在人事和课程等问题上主动向埃及国立大学教育工作者征询建议，还积极聘用埃及国立大学教师，以增进开罗美国大学与埃及本土大学之间的合作，加快融入埃及高等教育系统。然而，在推进“本土化”发展过程中，美国海外大学常常面临“美国化”的抵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针对校园内频繁出现的混乱局面，黎巴嫩政治家和学者极力主张将贝鲁特美国大学进一步“黎巴嫩化”，以重申该大学“满足地区需求”的教育使命。然而，贝鲁特美国大学管理层与美国高级官员一直试图利用资金援助和人事裁决来维持美国的影响力，以延缓“黎巴嫩化”发展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博弈逐渐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并一直持续至今。

（三）独立办学与合作办学协调并举

在早期发展阶段，相当一部分美国海外大学独立于美国宗教团体而自主创建，如罗伯特学院、美国女子学院和叙利亚新教学院等，其办学工作较为灵活。即便是一些由美国宗教团体创办的机构，如开罗美国大学等，也在二战后逐渐脱离了美国教会组织的控制，走向了独立办学的道路。因此，美国海外大学享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包括设有独立的大学董事会、拥有独立的财务体系和教师聘任制度、自主设计课程内容和学术项目、独立制定学历学位授予制度等。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海外大学的独立办学并非所有事项都是“绝对独立”，而是在当地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相对独立”。

为了保持独立办学的社会形象，美国海外大学试图划清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甚至担心接受美国政府援助会威胁自身的独立性，从而削弱其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例如，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 Adams）等人曾坚决反对开罗美国大学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并认为：“参与美国政府资金的使用，

将否定大学迄今为止所遵循的原则，即作为一个私立的、独立的、基于慈善的基督教事业，完全不受政府的支持或控制。”最终，开罗美国大学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只有在潜在风险“得到充分防范”的情况下，才会接受美国政府的援助：“无论方式或程度如何，我们不希望因为接受政府的资助而失去这一宝贵声誉（独立）的优势，这可能表明大学屈从于政府的影响。”^[20]由此可见，美国海外大学极为重视独立办学的原则，并将其视作机构发展的一大优势。此外，美国海外大学存在较大的机构发展差异，既有像贝鲁特美国大学和开罗美国大学等招生近万人的大型研究型大学，也有像塞萨洛尼基美国学院和地中海美国学院等招生不足千人的小型文理学院。因此，鉴于机构间的显著差异以及各自所处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不同的美国海外大学会根据东道国社会实际和自身发展需求而独立采取不同的办学策略，以便有效实现各自办学目标。在坚持独立办学的同时，美国海外大学也深刻认识到合作办学对校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主动建立并不断扩展合作伙伴网络。美国海外大学积极建立协同发展合作关系，陆续成立了近东学院协会、美国国际学院与大学协会以及美国国际学术图书馆联盟等合作组织，不断深化机构间合作办学，这对维护美国海外大学教育品牌、搭建学术资源交流与共享平台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综上可见，美国海外大学坚持独立办学与合作办学协调并举，不仅在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师资搭建和课程设置等方面享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性，从事独立的教育教学工作，同时也极为注重合作办学，通过建立合作办学组织等形式，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

（四）保持与美国本土大学密切联系

自创立以来，美国海外大学一直与美国本土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且这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紧密。美国海外大学的创办者大多拥有美国本土大学的教育经历，如罗伯特学院的创始人赛勒斯·哈姆林毕业于鲍登学院；叙利亚新教学院的创始人丹尼尔·布利斯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开罗美国大学的创始人查尔斯·沃森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等等。这不仅展现了办学者深厚的美国教育根基，也揭示了其背后所依赖的广泛的美国高等教育关系网络，为美国海外大学的办学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例如，在罗伯特学院筹办期间，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校长及数名教授曾为其募集图书馆建设资金，

并协助首批两名美国教师成功赴任。时任耶鲁大学图书管理员、未来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对此评价道：“在各自朋友的帮助下，新英格兰两所最古老的学院共同为土耳其的第一所基督教学院培养首批两位教授，这似乎尤为合理。”^[21]此外，美国海外大学从美国本土大学中招募了大量教师以充实师资队伍。阿默斯特学院、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众多美国本土大学成为美国海外大学的主要师资供应地，有力地支撑了美国海外大学的教育事业。美国本土大学教师以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为美国海外大学的学科专业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如密歇根大学的机械工程系主任约翰·艾伦（John Allen）教授为罗伯特学院工程系的成功组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时至今日，美国海外大学仍然得到美国本土大学的各种办学支持，如缅因大学、加州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分别协助保加利亚美国大学、亚美尼亚美国大学和中亚美国大学的办学工作。通过有效利用美国本土大学的教育资源，美国海外大学不断借鉴先进的教育理念和高效的管理模式，便于在短时间内构建起坚实的办学基础和良好的学术声誉。

在与美国本土大学密切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美国海外大学不仅加快了自身的成长与发展，还对美国本土大学起到了重要的反哺作用，为美国本土大学的学术探索与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美国本土大学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取得快速进步。许多曾在美国海外大学学习或任教的美国教师返回美国后，凭借自己丰富的海外教学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教学和研究见解，帮助美国本土大学快速提高学术发展水平。例如，在罗伯特学院执教七年之久的阿尔伯特·莱拜尔（Albert H. Lybyer）于1913年加入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后，推动了伊利诺伊大学成为“美国首所为从事奥斯曼研究的学生授予多个学位的机构”，被誉为美国的“奥斯曼研究之父”。^[22]类似地，贝鲁特美国大学毕业生、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Philip K. Hitti）在1926年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闪米特文学助理教授后，帮助普林斯顿大学创立了美国首个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项目^[23]，开启了美国本土大学从事阿拉伯区域研究工作的先河。由此可见，美国海外大学为美国本土大学广泛招募和选拔海外优秀人才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

· 86 ·

三、美国海外大学发展演进的历史影响

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演进展现了美国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延伸，对东道国及所在地区乃至美国本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海外大学在推动东道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培养东道国及所在地区优秀人才以及促进东道国与美国文化交流和融合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损害东道国教育主权、干涉东道国政治事务以及冲击东道国本土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一）推动了东道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

作为西方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海外大学打破了东道国旧式传统教育的垄断地位，客观上冲击了东道国落后的旧式教育制度，推动了东道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尤其在早期发展阶段，美国海外大学采用学分制、选修制以及博雅教育等制度，率先在东道国引领新式教育风潮，促进了东道国对现代西方教育理念、内容及方法的认识与理解，为东道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学习榜样。正如罗伯特学院院长乔治·沃什伯恩（George Washburn）所言：“罗伯特学院的榜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丹采取这一政策，即将世俗教育的益处赋予土耳其人。”^[24]通过先进的办学模式、新颖的课程设计、高效的管理体制以及专业化的师资队伍，美国海外大学为东道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强大动力，加速了东道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特别是针对东道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如女性教育、医学教育、体育教育以及农学教育等领域，美国海外大学扮演了重要的教育补充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东道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变革。例如，在对女子教育存在偏见甚至歧视的伊斯兰传统社会中，美国女子学院为当地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宝贵机会，在奥斯曼帝国开创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先河，有助于破除奥斯曼帝国社会中男尊女卑的封建落后思想，打破长期以来女性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禁忌。此外，贝鲁特美国大学较早引入男女同校制度，不仅促进了黎巴嫩妇女从“性别隔离”的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加速了男女同校制度在黎巴嫩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推广与运用，促使性别平等观念在黎巴嫩高等教育领域深入人心。毫无疑问，美国海外大学将西方教育模式引入到东道国社会，在推动东道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二）为东道国及所在地区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自创建以来，美国海外大学为东道国及所在地区培养了大量的政治家、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以及企业家等优秀人才，对东道国及所在地区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在数以万计的毕业生中，许多学生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艺术、教育、工程等领域崭露头角，并成长为当地的行业领袖。例如，贝鲁特美国大学在培养黎巴嫩优秀人才方面成就卓著，尤其在政府高层中，许多政府要员都是该校毕业生，如黎巴嫩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阿德尔·奥塞兰（Adel Osseiran）、黎巴嫩前总理萨利姆·艾哈迈德·阿勒·胡斯（Salim Ahmad Al-Huss）、现任黎巴嫩总理纳吉布·阿兹米·米卡提（Najib Azmi Mikati）、黎巴嫩驻联合国代表查尔斯·哈比卜·马利克（Charles Habib Malik）以及贝鲁特前市长比拉尔·萨利姆·哈马德（Bilal Salim Hamad），等等。除了政府官员以外，贝鲁特美国大学为黎巴嫩培养工程师、艺术家、历史学家等杰出人才更是不计其数，如电气工程师哈桑·卡迈勒·萨巴赫（Hassan Kamel Al-Sabbah）、艺术家和建筑师纳迪姆·卡拉姆（Nadim Karam）、历史学家卡迈勒·苏莱曼·萨利比（Kamal Suleiman Salibi）等，其贡献之大为世人称颂。

在协助所在地区其他国家的人才培养工作上，美国海外大学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法德尔·贾马利（Muhammad Fadhel al-Jamali）、约旦总理苏莱曼·纳布尔西（Suleiman Nabulsi）以及叙利亚总理法里斯·胡里（Faris al-Khoury）等多国政要均毕业于贝鲁特美国大学，他们在各自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领导角色。可见，贝鲁特美国大学是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它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培养了众多杰出的国家领袖、教育家、科学家、医生和企业家等各行业人才，对整个中东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评价道：“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受过教育的世界领导人比我能想到的任何其他机构——甚至哈佛大学都要多。”^[25] 不难看出，美国海外大学之所以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卓越成就，为东道国及所在地区培育优秀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促进了东道国与美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作为美国新教文化和西方文明的重要载体，美国海外大学是美国文化的坚定倡导者。首先，通过翻译和出版政治、历史、哲学和科技等领域的西方书籍以及发行报刊，美国海外大学不断对外推介美国文化，扩大了美国文化在东道国尤其是在当地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力。例如，在叙利亚新教学院，美国教师科尼利厄斯·范·戴克（Cornelius Van Dyck）将包括代数、天文学、化学、地理、医学等在内的众多西方教材和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由其合作翻译的《圣经》被黎巴嫩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称赞为“可能是一个外国人对这个国家文化发展产生的最有价值和最有效的影响”^[26]。其次，通过讲座、论坛和电影等形式，美国海外大学广泛宣传美国文化，以加深东道国民众对美国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开罗美国大学每周邀请一位知名演讲者介绍一部好莱坞影片，讨论其在历史、文化或经济方面的重要性。^[27] 最后，美国海外大学还积极资助当地学生赴美留学，并鼓励本土教师前往美国高校深造或考察，以便当地师生更为直观地接触和学习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

美国海外大学不仅大力宣扬美国文化，同时也积极传播东道国文化。通过翻译东道国的文化著作，美国海外大学将东道国文化思想引入美国本土，促进了东道国文化在美国社会的传播。贝鲁特美国大学校长贝亚德·道奇（Bayard Dodge）曾告诫本校教师：“你们也必须记住，你们可以从这个伟大的近东文化中吸收很多对自己生活有价值的东西。”^[28] 道奇本人不仅欣赏和学习伊斯兰教教义，还喜爱阿拉伯文化，由他翻译并编辑的有关伊斯兰世界知识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历史著作《阿尔纳迪姆的目录：十世纪伊斯兰文化概览》（The Fihrist of Al-Nadim: A Tenth-Century Survey of Muslim Culture）于 1970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反响热烈。此外，美国海外大学还在推动东道国与美国文化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宗教文化交流方面，美国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东道国的宗教文化、礼仪和习俗，并将美国文化与之紧密糅合，如道奇在为学生布道的过程中，不仅引用《圣经》内容，还融入了《古兰经》教义。可见，美国海外大学为东道国与美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搭建了一座“教育之桥”，便于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认识彼此文化，从而推动两国文

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四）损害了东道国教育主权

在整个办学过程中，美国海外大学经常涉及损害东道国教育主权的问题。教育主权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与国内各个层面上处理教育事务的最高权力，包含教育立法权、教育投资规划权、学校审批权、教育监察权等。^[29] 尤其在早期发展阶段，美国海外大学几乎完全受美国传教士和教会组织的控制，而不受东道国的法律约束，这极大地损害了东道国的教育主权。当东道国政府试图对美国海外大学进行管理或约束时，美国甚至不惜使用“炮舰外交”等强硬手段逼迫东道国屈从其办学要求。例如，美国海军上将大卫·法拉古特（David Farragut）在1868年率领美国舰队抵达奥斯曼帝国后，针对罗伯特学院的校区建设问题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施压，最终迫使奥斯曼帝国准许罗伯特学院兴建校园设施，并为其授予治外法权。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软弱及其在管理层面上的缺失，大多数美国海外大学并未向东道国政府提交正式的办学申请，也没有遵循东道国的教育管理规程，这对东道国教育主权构成了巨大危害。

随着东道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美国海外大学对东道国教育主权的侵犯有所减少，其办学活动逐渐受到东道国政府的严格管控。然而，这种监管在实际操作中未能始终有效执行，美国海外大学损害东道国教育主权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例如，埃及政府曾在1958年颁布了第160号法律，要求将埃及境内的外国学校完全“阿拉伯化”，首次试图将开罗美国大学置于其直接监管之下。然而，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下，埃及政府被迫允许开罗美国大学不受这一法律的约束，开罗美国大学成为埃及唯一一所基本不受当地政府控制的教育机构。^[30] 可见，尽管美国海外大学为推动东道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早期的办学初衷以及因东道国政府软弱和管理缺失而导致东道国教育主权旁落，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五）干涉了东道国政治事务

在传播美国教育理念和价值观的同时，美国海外大学也常常干涉东道国的政治事务，潜移默化地影响东道国的政治局势。例如，当奥斯曼帝国军队在1875–1876年镇压保加利亚独立运动时，罗伯特学院的美国教师阿尔伯特·朗（Albert Long）和乔治·沃什伯恩等人最早揭露奥斯曼帝国军队对保加

利亚平民犯下的暴行，迅速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并激起了西方国家对保加利亚独立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对奥斯曼帝国政府而言，此举无疑进一步激化了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对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极具煽动性，引发了土耳其人的强烈不满。对此，沃什伯恩直言不讳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个人的影响力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变革。”^[31] 正因如此，土耳其的主流媒体《共和报》（Cumhuriyet）刊发了一系列抨击罗伯特学院的文章，认为罗伯特学院校友是美帝国主义的奴仆，并指责该校催生了保加利亚的分裂主义及其独立。^[32] 尽管罗伯特学院展现了人道主义关怀，旨在拯救保加利亚人民免受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摧残，但它也明确支持保加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干涉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事务。

现今，在某些关键时刻，如当地出现军事动荡或政权更迭等重大社会变革时，美国海外大学仍会以各种方式干涉东道国的政治事务，以迎合当地民众的政治需求并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例如，当“阿拉伯之春”运动在2011年蔓延至埃及之时，开罗美国大学参与了推翻穆巴拉克总统的埃及革命运动，并发起了“广场大学”倡议，收集关于此次革命的口述历史与文物资料。对此，美国前驻埃及大使丹尼尔·库尔策（Daniel Kurtzer）公开赞扬开罗美国大学在埃及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该校灌输的价值观“让他们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可以说，美国海外大学凭借自身的特殊地位介入东道国内政，常被视为“美国大使馆的延伸”^[33]，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战略工具之一。

（六）冲击了东道国本土文化与价值观

在漫长的办学过程中，美国海外大学不断向东道国民众灌输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对当地文化进行大肆侵蚀和渗透，强烈冲击了东道国本土文化与价值观。首先，通过引入学分制、选修制以及博雅教育等教育制度，美国海外大学在促进东道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地民众对东道国传统教育的漠视，从而削弱了本土文化在东道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语言与知识体系的变革也是美国教育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海外大学普遍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这对非英语国家的本土语言使用产生了不利影响。课程设置过于侧重西方科学和技术知识，忽略了当地传统文化知识，导致一些本土知识逐渐边缘化。

此外，在早期发展阶段，美国海外大学的办学宗旨在于传播基督教福音，其教育活动充斥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元素。在西方基督教思想文化的熏陶下，东道国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深受影响，从而对东道国的传统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最后，通过营造美式校园生活环境，美国海外大学不断重塑学生日常生活方式，并将美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当地学生，这些观念与东道国的传统价值观发生激烈碰撞，从而导致东道国本土的社会价值观出现动摇。由此可见，在教育模式、知识体系、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美国海外大学无时无刻不向东道国灌输美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当美国海外大学所宣扬的美国文化被完全视为先进与现代化的象征时，东道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必然会遭受严峻考验，当地民众会对本土文化产生高度的自我质疑，甚至陷入对美国文化的盲目崇拜，进而引发本土文化认同的模糊与价值观的混淆，这对东道国的文化传承与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四、结语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海外大学已成为美国跨境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不仅是对美国教育理念的持续践行，也是对时代变迁的主动适应，更是对全球化背景下跨境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模式的深入探索。在这一历程中，其鲜明的发展特点，如办学活动深受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美国化”与“本土化”动态博弈、独立办学与合作办学协调并举以及保持与美国本土大学密切联系等，共同构筑了美国海外大学的独特发展轨迹。毋庸置疑，美国海外大学的发展具有双重的历史影响，既在推动东道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培养东道国及所在地区优秀人才以及促进东道国与美国文化交流和融合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对东道国的教育主权、政治事务以及本土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在审视美国海外大学时，必须秉持客观而审慎的态度，既要认同其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要警惕和防范其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

美国海外大学长期活跃于世界高等教育舞台，其丰富的跨境办学经验，可以为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工作在本土融合、协同发展以及政府支持等方面提

供一些有益借鉴。首先，美国海外大学注重本土化办学实践，根据东道国社会发展需求，灵活调整办学策略与教学活动，逐步成长为与东道国社会深度融合的“本地机构”，实现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应将本土化办学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融进去”，即重视与东道国本土社会相融合。我国高校境外办学机构需要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通过灵活开设当地文化教育课程、适度扩大当地师资队伍以及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等方式，不断提升东道国民众对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工作的认可与信任，从而为境外教育项目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其次，美国海外大学通过采取协同发展的合作策略，在教育资源共享和办学经验交流等方面形成合力，为其在激烈的国际教育竞争中获得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保障。对此，我国高校境外办学机构可探索构建一个校际合作平台，推动跨校协同发展，如成立“中国高校境外办学合作联盟”等合作组织，促进高校间的资源共享与经验互鉴，以应对境外办学面临的各种挑战，不断提升境外办学的质量与效益。最后，美国海外大学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二战后，美国政府竭力支持跨境高等教育发展，并给予美国海外大学巨额的资金援助。由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高校境外办学工作的支持力度，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增加财政补贴等方式，为高校境外办学机构在改善教学设施、扩充科研资金、设立学生奖助学金等方面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以提升高校境外办学工作的整体发展水平。

注释：

①1882年7月，化学与地质学教授埃德温·刘易斯在叙利亚新教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因推崇达尔文进化论，遭到校内保守派势力的强烈反对，最终迫使刘易斯辞职，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声援刘易斯的校园抗议活动，精通阿拉伯语的医学系教师大部分选择辞职以表达对刘易斯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LANE J E. Global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Managerial and Leadership Challenges [J].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2011 (155): 5-17.

- [2] PURINTON T, SKAGGS J. American Universi-

- ties Abroad: The Leadership of Independent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M].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7:2.
- [3] [18] SABEV O. Spiritus Roberti: Shaping New Minds and Robert College in Late Ottoman Society (1863–1923) [M]. Istanbul: Bogazici University Press, 2014:55,125.
- [4] [19] [32] SJÖBERG E.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New Turkey: American Peace Education in the Kemalist Republic, 1923 – 1933 [M].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22:222,236,242.
- [5] 李军,段世飞,胡科.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阶段特征与挑战 [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20(1):81–91.
- [6] 石毅. 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家战略 [J]. 教育研究, 2020(9):66–80.
- [7] IGNATIUS D. Kidnapping a University in Beirut. [EB/OL]. (1986-09-28) [2024-04-2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opinions/1986/09/28/kidnapping-a-university-in-beirut/c29ec8a7-428d-48f2-baef-1b0b8ac34cde/>.
- [8] LAVERTY E B, LAVERTY R P.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Bulgaria: Institution-building in a Developing Democracy [J]. Maine Policy Review, 1993, 2(3): 69–84.
- [9] VERBIK L. The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 Models and Trends [J].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07(46):14–15.
- [10] [13] [21] [25] LONG K A.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Abroad [M]. Leiden: Brill Sense, 2020:41,58–59,21,95.
- [11] DANIEL R L. 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the Near East, 1820 – 1960 [M].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0:236.
- [12] NINKOVICH F A.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 S. 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1938–195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52–53.
- [14] KHALIL O F. America's Dream Palace: Middle East Expertise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141.
- [15] [23] CHOUGULE P.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tersections with American Interests [M]. Leiden: Brill, 2022:45,20.
- [16] MUNRO J M. A Mutual Concern: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M]. New York: Caravan Books, 1977:103.
- [17] CAROTHERS T. Aiding Democracy Abroad: The Learning Curve [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9:5.
- [20] [27] [30] MURPHY L R.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1919–1987 [M].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87:99,114,152.
- [22] LOWRY H W. The State of the Field: A Retrospective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of Ottom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anada [J]. Turkish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2000, 24(1):65–119.
- [24] PETROV N. Robert College of Constantinople: Crossroads of Faiths, Cultures, and Empires 1863–1913 [M].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23:192.
- [26] ANTONIUS G. The Arab Awakening: 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 [M].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5:48.
- [28] VANDEMARK B. American Sheikhs: Two Families, Four Generations, and the Story of America's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M].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2012:108.
- [29] 潘懋元. 潘懋元文集·卷3·问题研究(上)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209.
- [31] WASHBURN G. Fif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and Recollections of Robert College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9:100–101.
- [33] WALSH D. Revol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here Pompeo Addressed Middle East [EB/OL]. (2019-02-06) [2024-06-27].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06/world/middleeast/american-university-cairo-pompeo.html>.

(责任编辑 廖宇红)